



李宝岳

李宝岳文集

Li Bao Yue Wen Ji

李宝岳◎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李 宝 岳 文 集

李宝岳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宝岳文集/李宝岳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81139 - 829 - 8

I. 李… II. 李… III. 刑事诉讼法—中国—文集—IV. D925.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0251 号

李宝岳文集
LIBAOYUE WENJI
李宝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34.2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65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829 - 8/D · 678
定 价: 75.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o.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教材分社电话: (010) 83903259
公安图书分社电话: (010) 83905672
法律图书分社电话: (010) 8390563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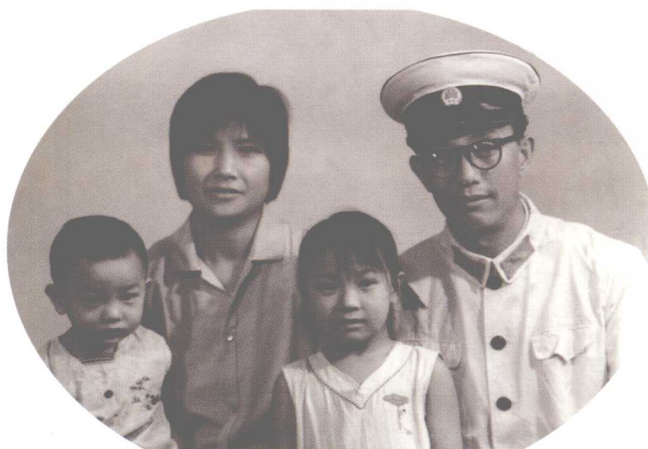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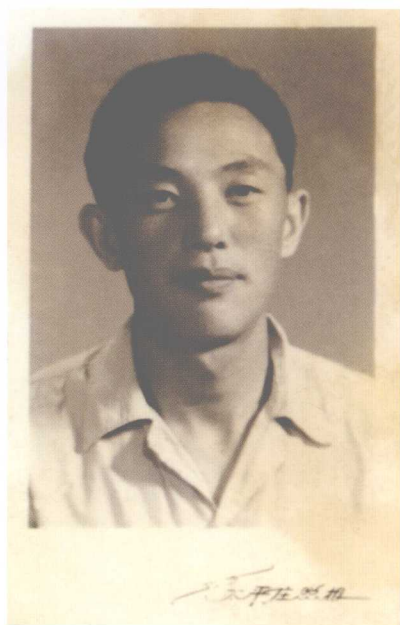
↑ 李宝岳（摄于2009年5月）



← 父母留影（1963年）



↑ 四口之家合影（1976年）



↑ 大学毕业留影（1964年）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岸东

北京 萧火非 照相

↑ 结婚纪念照（1970年9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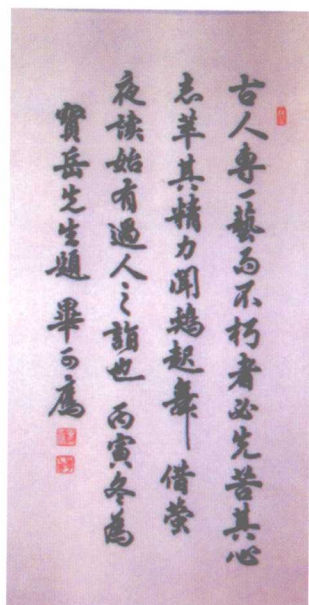
↑ 全家福（2008年7月）



↑ 为庚以泰、巫昌祯教授夫妇祝贺八十寿诞合影（2009年）



↑ 曾任福建省人大副主任的宋峻教授书写的条幅



↑ 中国政法大学毕可鹰教授早年写下的条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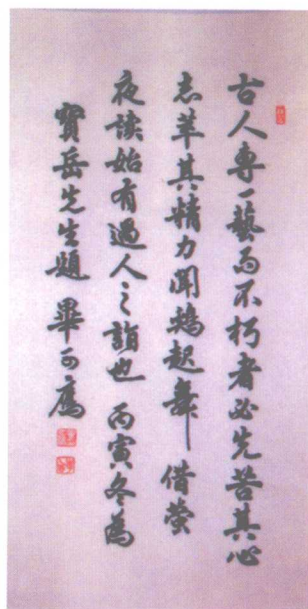
↑ 全家福（2008年7月）



↑ 为庚以泰、巫昌祯教授夫妇祝贺八十寿诞合影（2009年）



↑ 曾任福建省人大副主任的宋峻教授书写的条幅



↑ 中国政法大学毕可鹰教授早年写下的条幅





↑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成员合影
(1999年3月)



↑ 硕士生通过论文答辩后与导师及答辩委员会
委员合影 (2001年6月)



↑ 博士生通过论文答辩后与导师及答辩委员
会委员合影 (2003年6月)



↑ 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来中国政法大学刑事
法律研究中心座谈 (2004年11月)



↑ 主持刑事法律援助部工作



↑ 亚洲基金会项目发展部主任来访
(2004年6月)



↑ 与陈光中教授、顾永忠教授、石家庄市司法
局副局长任保山(后排右一)和国际司法桥梁
法务主任迈克尔·龚佩斯(前排右一)共同签
署一项法律援助协议 (2006年)





↑ 与陈光中教授等在石家庄市司法局调研后合影 (2006年10月)



↑ 访问英国与英国大法官兼司法大臣欧文勋爵亲切会见后合影 (1999年)



↑ 率团在云南省丽江市司法局进行法律援助调研时合影 (2004年7月)



↑ 圣彼得堡涅瓦河合影



↑ 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杨永林(右三)等一道访问俄罗斯内务部法学院同该校领导合影 (1996年6月)



↑ 访问加拿大同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主任弗朗西斯·戈登女士等合影 (2003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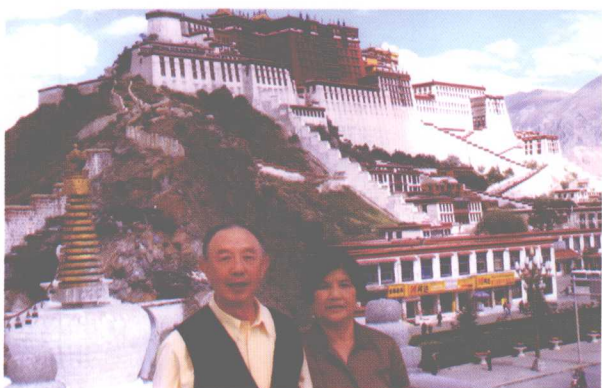
↑ 访问爱尔兰同爱尔兰律师协会会长等合影 (2006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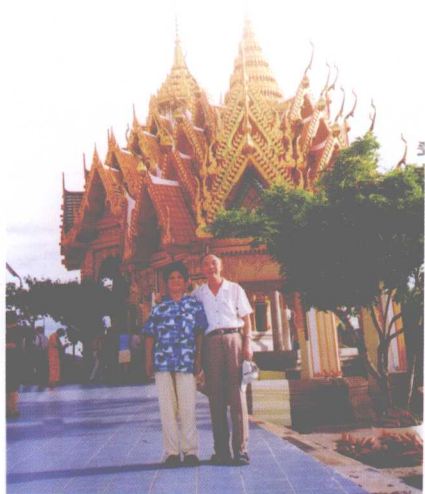
↑ 黄山留影（2001年9月）



↑ 澳门大三巴留影（2004年11月）



↑ 西藏布达拉宫留影（2007年9月）



↑ 泰国留影（2001年8月）



←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悉尼大桥留影（2001年1月）





↑ 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留影（2008年10月）



↑ 尼亚加拉大瀑布留影（2008年10月）



↑ 意大利比萨斜塔前留影（2005年9月）



↑ 哥本哈根美人鱼铜像前留影（2007年7月）

作者絮语

春去冬来，岁月如梭，转瞬我将满 70 周岁，进入古稀之年。1947 年至 1964 年，是我求学期间；1964 年至 2003 年是我正式在岗工作时间，期间主要在北京政法学院（后改为中国政法大学）从事法学教学工作，教授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和律师学三门专业课程，教授的对象主要是本科生、大专生（包括函授生）、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生，同时参加过律师资格考试辅导等多种社会培训。1979 年起做兼职律师，2003 年退休后改做专职律师，前后近 30 年。期间，办理过大量案件，主要是刑事辩护或刑事代理，也办过少量民事代理案件，办案效果颇佳，受到业界好评。退休前，曾在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陈光中教授主持的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兼职。目前，仍跟随陈光中教授做些科研工作。

教学期间，我也尽力做些行政兼职工作，当过刑事诉讼法教研室副主任，做过多年法律系工会主席，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首届教代会常务副主席等。

为了纪念 70 岁生日，也是向关爱我的老师、同学、学生和亲友做个汇报，决定出版我的个人文集。文集中把我在北京政法学院恢复、重建后发表在期刊、专著中的文章分类集结成册，计期刊论文 43 篇，报刊论文 14 篇，法律顾问与函授答疑文章 35 篇，办案实录 9 篇以及媒体涉及我的报道 11 篇。教材类著述未予选入。文章均以当时发表的文字为准，不做修改，极个别错漏作了校正。这些作品中，有多篇是与著名法学家如陶髦、宋峻、张佩霖、程味秋教授等的共同之作，写作中受到他们的造詣熏陶与栽培；有多篇是与我带的法学硕士生的共同之作，既体现了些许我的授业之道，也使我向他们学到了许多新鲜知识。总之，文集从这个角度说明，它并非我的一人之功，而是包含了多位名家、教授和莘莘学子的心血。也以此纪念之，怀念之！

是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培养成大学教师，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法制春天的到来，使得被迫解散的北京政法学院得以恢复和重建，我也得以重返学校课堂，有了实现抱负的平台。毛泽东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教导我们，要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说“从这点出发，就可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年届古稀，回首往事，我没有成为白求

恩那样“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但是也做到了“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因为我朝着那远大的目标努力了，奋斗了！

我曾为一位著名的教授写过一首“寿赞”诗，诗中写道“人生七十今不稀，科学百岁可期许”。但是，对于我自己却不敢有这样的奢望。我从70年代末连续患病，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为此，借出版此文集的机会，特写点多余的话，追忆一些被尘封的往事，对自己做些盘点，也是向读者介绍一个比较完整的我，这或曰“王老二卖瓜”或曰“自我盖棺”并以此作为文集的前言，也是人生的絮语。

苦乐童年

听妈妈讲，我出生于民国二十八年腊月初二。由于早先不知有查万年历之事，所以在学历的表册上登记出生年月时，都同时写上“1939年12月2日（旧历），属兔”。多年后经查万年历，始知我的准确出生日期是1940年1月10日。但是，户籍、身份证等都已经改不过来，只得任随其便。而我每年过生日都是在阴历的腊月初二。

我出生在北京广渠门内一个叫做“安庆寓园”的地方，据说是一处乱坟岗边的租房里。我的老家是通县东石村（现为北京市通州区东石村）。由于“卢沟桥事变”，父母、哥哥等举家搬进北京城里。那时，我的老舅在花市西口开了一家钟表铺，哥哥在那里做学徒，我父亲有制作糖果、糕点的手艺，于是躲进城来在花市东大街摆摊设点以维持生计。日本投降后，全家才回到东石村。

我们回到老家后，父母仍以务农为主，同时兼卖烟酒、食品，生活勉强能够维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记得1947年或1948年夏天，北京发大水，村里人青黄不接，家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于是街坊们求我父亲到北京城借粮。父亲冒雨带着人马去北京找我老舅托人、说情才从粮店老板处借来若干担小米。不知是资本家囤积居奇的缘故，还是父亲带领的骡马队淌河涉水，使粮食受潮的结果，用借来的小米蒸出的饭、熬制的粥，都有一股浓浓的霉味，吃着发苦。但是，毕竟帮助乡亲们度过了这场饥荒。父亲为街坊百姓排忧解难的举动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娱乐工具，全凭大自然的恩赐。我喜欢到村北的河里游泳，特别是“泥浴”。还在一次呛水险情中突然仰着游，学会了仰泳这一救命的招数。

我儿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逮蛐蛐。我想我可以算得上聪明伶俐了，有时逮的蛐蛐多得没处放养，于是扔到我家那两棵洋槐树上，傍晚时分，蛐蛐们便

高声齐唱，震耳欲聋，好不欢喜，大人们也以此为趣事！但是，一次躺在母亲怀里让刚捉到的蝨蝨随自己一起吮吸母亲的乳头，谁知这只蝨蝨将母亲的奶头咬破，我这时才意识到可爱的蝨蝨已成仇敌，于是将蝨蝨的头拧了下来。这件事直到母亲上了年纪说及遇到阴雨天仍乳房发痛，我悔恨、痛心不已！冬天，我和小朋友们，三五成群，兵分两路，隔一条壕沟用土坷垃“打仗”；冰冻三尺时，我们就结伙到河面上打冰碴；在那大雪纷飞和大雪过膝的日子里，既可以坐在家里，门外支起筛子捕捉麻雀（真个是“门可罗雀”），也可以带着爱犬去田野里围着秫秸堆追捕藏匿的野兔。有时还跳高坡，跳深沟，等等。充满童趣和野趣。

我的小学生活

大约是1947年的冬天，我开始上小学了。我上的小学叫东石村初级小学，地点设在村中关帝庙的后院。学校院门处立有孔夫子圣人的塑像，学生要行鞠躬礼后才能进教室。记得我第一次上学是双手捧着个点心匣子去的。匣子是木制的，有像抽屉一样的盖，原本是装糕点用的，却成了我那时的“书包”。还记得四个年级的学生都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学校也只有一位老师。那时的学生除了描红模字以外主要是写石板字，为了写好石板字，我将母亲陪嫁盆景中的细玉枝条拿来当石笔，写得精细、清秀，受到老师的喜爱、夸奖。老师爱我，我也爱老师。记得三四年级时我与同学做值日生（两个人一拨儿），主要任务就是清晨天还没亮就去敲醒老道进庙门，然后走进老师宿舍给老师倒尿盆、生炉子，等炉火烧旺后搬进老师的卧室并坐上铁壶烧开水，以备老师洗漱用。干完这些活，我们才可以回家吃饭以便饭后上学。那时没有中“煤气”的概念，也不曾出现过这等事故，大概是老师的卧室四面透风的缘故吧！我小学四年级时，一开学，学校换了老师，据说我的首任李老师被调回通州了。听说他家住在新城南门内，等到我在通州上中学时还曾特地到南门内转悠，梦想能撞见李老师，但希望之神并未降临。

我上小学时，起初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久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就到村子来了。那时，我们的小学开始停课。记得有一天下午，一个卖锅碗瓢盆的推车小贩来到我家门前叫卖，招引得满街筒子的乡亲们争相购买。这位小贩的生意大概从来也没有这样火过，喜上眉梢！我的母亲忍不住了，于是向小贩讲明我们这里的“金银券（法币）”已经不能花，成了废纸。这个小贩真的吓傻了眼，哀求人们救救他。后来还是经我母亲说情，要乡亲们改用棒子粒、黄豆等粮食兑换所买的货，得以圆满了结。母亲营救小贩的善举，我也记了一辈子！

这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和姐姐准备出门找人玩耍，却发现门外大街上

坐着一堆堆的人，每个人的帽子上都插着秫秸穗，如同一座座柴火垛。他们见到我们便打招呼，于是我们大着胆子靠了过去。这才知道是解放军大部队进村了。我家离广渠门东南25里，我虽没有见过日本鬼子，但听人们说起躲日本鬼子的事，也体会到了它的淫威；国民党的一支马队经过村子时，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军人用皮鞭抽打所谓影响了行军的村民，我怕得很；如今，看到这样不扰民又和蔼的解放军，真的感到亲切。后来解放军分配了一个班，在我家号房住宿，每天帮我们挑水，打扫院子，还在村子西边挖了重重的壕沟，说是要攻打北京。那时天天能够听到远处的炮声，说是打永定门的。后来才知道北京是和平解放的。

由于解放大军的到来，村里闹起了农会。后来，母亲被工作队吸收加入了农会，再后来当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作为村民的主心骨，农村干部们自然要经常商议。那时，几乎每天晚上母亲都要去关帝庙开会，她患有倒眉眼，曾碰到大庙拐角的墙上（拐角路边是一条河），鼻青脸肿。为此，我随即成了她的“拐棍儿”，每天陪着她开会。也因此，我从小受到了这种农民革命的洗礼。

重新开学上课后，我似乎更懂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村子里活动很多，多有我们小学生参加。一次村里搭台演戏，我和同学演出一小段“双簧”，我在后面说的，演出颇受欢迎，但我却不知怎么退的场下的台。村里领导要我管理学生学费，我用母亲的一个银制首饰盒存放这笔钱，一个寒假数过多次，真的如数家珍，开学后分文不少地交给学校，受到村领导和老师的赞扬。

1952年，我终于初小毕业，改到次渠村中心小学读五六年级。东石村距离次渠村有三里多路，我们是结伴早出晚归，中午带窝头、咸菜在学校吃。记得有同学带了五香咸菜分给大家吃，分外好吃，于是我也想要母亲照此制作，我还从一同学处学到了将蒸熟的白薯切成片晒干后冬天当主食吃，异常香甜！读高小时的同学，年龄差别很大。1953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班有一位男同学报名参了军，我们既高兴又恋恋不舍。记得送他时，他骑上大红马，身披大红绸带，胸前戴了朵大红花。期间，我们每个同学都写了不知多少封慰问信寄给志愿军战士，同时受到保家卫国的教育。还记得有一次晚上从次渠村回东石村，我们看到远处一座砖窑的后面有火球升落，有同学说是“鬼火”、“狐狸炼丹”，说得人们毛骨悚然；第二天告诉了老师，老师解释说是“磷火”。这引导我们从迷信走向科学！

1954年的秋天，我考上了我们专区有名的通县一中，即现在的潞河中学。

六年潞河

河北通县中学原名潞河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改名为河北通县中学、通县一中等，现又恢复叫潞河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始建于1867年。1951年人民政府正式接管该校，使之回到人民手中，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潞河中学校园环境优美，那时的面积就有三百余亩，有十余幢楼房，呈欧洲建筑风格，多为古城堡式，间或有若干砖瓦平房。红楼为全校最高建筑，当时它与通州城内的鼓楼、古塔合为“三高”。登红楼顶端远眺可俯视全城。楼顶内悬挂有一口大铜钟，钟声远扬十里之外，学生上下课就靠这里的钟声。校园东边有标准的运动场，四周是四百米的环形跑道，西侧有可容千余观众的阶梯看台。校园内还有湖、亭、假山等，绿草如茵，古树参天，美如花园。新中国成立前为富家子弟学习之所，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劳动人民子女的学习乐园。这里的干部、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先进、齐全，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我在这里度过了六个春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六年的学习期间，有以下几件事令我不能忘怀：

第一，我曾靠自带干粮读书。那时每周六傍晚回家，周日傍晚带着一周的干粮返校。在校期间，每天三顿饭，都要到校锅炉房将干粮烤热后吃，五六月份周末玉米饼经常会变馊，掰开见拉丝，烤后也得吃。烧锅炉的董大爷见我可怜，曾用他人废弃的罐头盒装个硬铁丝帮我做了一个“炊具”，教我从家中带些炒熟的细玉米粉用它制成稀粥，以便干稀搭配。我感激涕零，于是经常帮他干些添煤、扫地的活计，至今仍怀念这位慈祥的老人。

我家离潞河中学有近三十里的路程，冬夏春秋我都是这样艰难地上学。情况终于反映到校长方田古那里，他指示我班新来的班主任耿宝珍老师对我进行家访。耿老师徒步三十里来到我家，并在我家留宿一夜。他深感我家境的窘迫，于是回校后帮我申请到乙等助学金。从此，解决了我学习的后顾之忧，我更加刻苦学习，初中三年里，我以全优成绩毕业！

第二，我一心想初中毕业后能考上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既不用花学费又能早学技术，挣钱养家，孝顺父母。没想到1957年毕业时，通县专区的中专学校一律不招生，只能报考高级中学。于是下决心报考本校。准备考试期间，真有点“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苦读中头脑不清醒时，常去自来水管下用冷水浇头。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被本校高中部录取。

开始上高中时，母亲正帮姐姐带孩子，姐姐每月给我10元钱作伙食费和学杂费。但到了高中二年级时，姐姐因子女多生活也显艰辛，无力再支持我的

花费。这时姐夫得知首都特殊钢厂招工，征询我的意见可否一试。我趁周日赶到钢厂面试，结果厂方答应要我。我本想高中毕业后考大学，当天在返回通县的火车上不禁伤心落泪。回到学校后，我很沉闷，是班主任张继辉老师及时发现我的心理变化，他找我谈心，我如实讲了因家境困难，想退学当工人的打算。张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高中生名单已经上报了国家教育部门，不继续读书而去应聘当工人是“开小差”，并指出有困难应依靠组织解决。张老师的教诲使我惊醒，同时学校批准了我甲等助学金，使我得以完成高中学业。

我对方田古老校长及耿宝珍和张继辉两位老师有着特别的感恩之情。我工作后曾返校向他们汇报我后来的学习与工作情形。方田古老校长在1996年底给我的一封来信中说：“您在通县一中学习时，能够享受助学金，这是党与政府对青少年学生的关怀，不可感谢我个人。您的成才，是党的教导、老师的培养和你个人努力的结果，我仅是做了应做的工作，无功可言。我能有你这样的优秀学生甚感欣慰。”他还将他的专著《汗滴禾下土》托人送给我。2008年耿宝珍老师知道我的身体不好，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非要由我几位初中同学陪同到我家来看我，再一次感动了我。

第三，我选择了学习文科。我们学校出了个有名的作家叫刘绍棠。他16岁在校读书时的作品《青枝绿叶》即登上了高中语文教科书。他成了我们的偶像。他经常回到学校作报告，鼓励同学们搞文学创作。在他的影响和鼓勵下，我经常给学校板报、油印校刊写稿，并多次被刊载。我还与同学创作、表演相声，有些作品还送到了通县文化馆。

第四，高中毕业时，我被学校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但是，后来学校党支部书记马林章同志亲自找我谈话，说由于赫鲁晓夫反华，中苏关系恶化，因此留学的事不成了，要我重新补报高考志愿。最终我被北京政法学院录取，走上了政法工作道路。

决定终生的学业

高中毕业离校后，我在北京皮鞋厂打工，先是清理成品皮鞋，后又做泥瓦工。在打工期间，年迈的父亲从市中心姐姐家徒步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紫竹院北门的皮鞋厂，给我送来了北京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可以想见，我那一生为农的老父亲该是多么的兴奋！我也决心做一名有出息的农民的儿子！

1960年9月1日，我到北京政法学院报到，成为这一届政法系四班的一名学生。在这里，我们接受了系统的高等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不胜荣幸之至！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同学们选举我当班里的学习委员，这一任职伴我大学毕业。